

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云南3个民族村寨为例

周常春,和月月,操 婷

(昆明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3)

摘要:以云南3个民族村寨为例,实证分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首先通过 SPSS 对数据进行因子降维分析,提取出4个维度因子,再通过 AMOS 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政府参与旅游扶贫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交流、社区环境和素质技能4个维度上面,同时这4个维度又不同程度地影响地区的基础建设、经济收入、行业发展、居民就业、噪音干扰、民族文化、交通拥堵、知名度、社区交流、居民团结、生活技能、环保意识及文化保护。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开发优质旅游产品;加强宣传力度,强化人文旅游资源;保护核心竞争力,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提高环保意识,为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提供新思路,为同行业学者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049(2019)04-0088-1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旅游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重要活动。同时,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旅游地国民经济的增长。许多贫困地区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最终摆脱贫困,而且返贫率低,脱贫效果好。贫困地区大都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19处,省、市级风景名胜区约400处,其中多数处于老、少、边、山、穷地区。利用贫困地区天然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来开发旅游业是帮助当地贫困村民脱贫的最佳途径之一,因此“旅游”和“扶贫”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

云南省共有73个国家贫困县,数量居全国第一,其中有51个国家贫困县属于少数民族贫困县。云南省四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是乌蒙片区、迪庆藏区、滇西边境片区以及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这些贫困地区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产业单一,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开发力度不够等缺陷,导致该地区经济发展严重落后。如果只靠单一的务农收入来源,远远解决不了居民摆脱贫困的现状,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地区长期经济发展落后的现象。然而,云南这些贫困地区具备的一大优势便是天然的自然风光,利用原始的人文景观、山水奇景等自然优势再加上合理的开发,可以吸引大量外地游客来当地旅游;同时让当地居民投入到旅游行业中来,既解决了就业问题,为当

收稿日期:2019-06-13;修回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1368023);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博生科研预研计划项目(20181109019)

作者简介:周常春(1970—),女,广西柳州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旅游扶贫;和月月(1991—),女,河南新乡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操婷(1992—),女,湖北武汉人,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扶贫。

地居民增加了收入来源,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改善贫困现状是有效实施扶贫战略的一项有效决策。随着人们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在城市紧张工作的人们愿意利用闲暇时间回归自然,放松自我,切实体验乡村旅游带来的静谧。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将给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因此,旅游扶贫将在扶贫进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既可实现居民增收脱贫,又能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旅游业作为扶贫工具,我国对于旅游业的研究相比国外而言晚了几十年时间,但旅游扶贫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仍然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目前关于旅游扶贫的模式有很多种,常见的主要有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政府主导模式、景区带动模式以及民族文化旅游模式等,国内学者对旅游扶贫模式的研究也比较成熟(表1)。

表1 旅游扶贫模式研究情况

时间	学者	研究内容
2018 年	张晓等 ^[1]	景区带动模式、“一村一品”、民俗文化旅游扶贫模式
2017 年	屈小静 ^[2]	政府主导模式、RHB 模式、亦农亦旅模式、生态旅游扶贫模式
2015 年	刘祥恒和罗明义 ^[3]	非大众旅游扶贫模式、资源环境带动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模式
2016 年	龚艳和李如支 ^[4]	旅游扶贫试验区模式、创新旅游商品模式、对口旅游扶贫模式
2017 年	李赛男等 ^[5]	BOT 模式、传统风俗旅游、生态旅游模式、民族文化旅游模式
2017 年	徐宁等 ^[6]	生态文化旅游扶贫模式、和边境贸易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移民迁置模式
2018 年	银马华等 ^[7]	政府主导模式、战略联合模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模式及区域联动模式

其中,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是旅游扶贫最早采用的模式,同时也是对旅游影响最深远的扶贫模式,该模式强调各级政府要在旅游扶贫中占主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国内学者关于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效应及作用等方面。饶勇等^[8]对我国各级政府在旅游扶贫进程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说明和总结。桂拉旦和唐唯^[9]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市场失灵”情况的影响,导致政府在履行和执行其职能时会出现漏洞差错等问题,因此在旅游开发进程中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特征,特殊情况则特殊对待,从而使政府可以更加完善地发挥其职能和作用。杨德进等^[10]认为,政府在旅游扶贫进程中要时刻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应充分发挥计划、管理、组织、领导、监管及推广等各方面的职能。葛绪锋^[11]和陈友华^[12]提出在政府的主导带领下,应增加旅游开发资金投入,通过制定战略计划、法规政策、有效宣传推广等途径加大旅游扶持力度。邱硕立^[13]强调政府对旅游产品、旅游环境及旅游市场信息发布等宣传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公共设施的配备、旅游资源的保护、制定有效政策等方面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综上所述,旅游扶贫模式种类多样,且利弊都有,无论采取单一的扶贫模式还是混合的扶贫模式,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已有条件和区位特征来合理开发适合当地的旅游扶贫模式。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一般采用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原因如下:云南省贫困县数量居全国首位,且有非常多的少数民族村寨,但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贫困山区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因此对于文化深远、自然资源丰富,但可进入性差的贫困地区来说,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通过依托政府招商引资、规划宣传、大力建设等途径开发旅游业才是解决当地经济落后、居民贫困问题的最有效扶贫模式。由于在研究旅游扶贫方面,大多数学者主要采取定性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的比较少。本文将在先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可邑村、大理鹤庆新华村和石林彝族第一村3个民族村寨为典型案例地,进一步实证分析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对比分析其影响因素的强弱程度。

二、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研究在政府的主导下乡村旅游的发展情况,以及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影响居民生活状

况、乡村经济环境及村寨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全面系统分析其作用机理,从而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运行机制并促进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主要以大理鹤庆新华村、可邑村、石林彝族第一村这3个民族村寨为例,分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对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对象为社区居民。其中,大理鹤庆新华村是政府最早开发的村寨,村寨95%以上的居民长期从事银饰打造和买卖工作;可邑村自2002年被政府开发以来,逐渐被打造成新农村形象,村寨居民除了种植玉米、烤烟等农作物外,多数人还被安排到该村寨的景区工作;石林彝族第一村90%以上的居民都被安排到石林景区内工作,且员工都享有年终分红。

(一) 研究假设模型

1. 旅游扶贫的影响研究

在早期一些国外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已明确指出,开发乡村旅游可以作为扶贫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并且扶贫效果明显,贫困居民不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同时也可以获得非经济利益。Renard^[14]认为,居民在旅游扶贫中获得的非经济利益包括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改善,教育及医疗设施技术水平的提高等,而且这些非经济利益能让居民体验到更强烈的直观感受。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发同样会破坏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历史文化,而且损害严重。Fleischer and Felsenstein^[15]通过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指出,乡村旅游存在收入低、规模小、季节性短等弊端,大部分从事景区工作的人收入普遍比较低,同时还要承担土地被征用、物件上涨等风险。

旅游扶贫影响社会、经济、文化、居民感知等各个方面,这些影响既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表现在:开展旅游扶贫能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素质、人均收入及生活技能水平;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完善地区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拓宽贫困地区居民的眼界,增长其见识,并增加其和外界接触交流的机会;带动一二三产业的联合发展,加快农业向服务业的转化速度,促进当地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旅游扶贫。不利的方面表现在:开展旅游业可能会导致当地民风本质受到破坏,居民之间产生利益矛盾,影响当地居民的和谐生活;旅游景区开发建设不合理会造成文化失真和资源浪费,相关部门设施不完善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居民之间存在利益差距;还可能出现景区物价飞涨、同行之间不正当竞争等不良现象。

2. 研究假设

基于旅游扶贫的相关研究理论基础^[16-18]以及参考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19-22],同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构建出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对乡村旅游影响的指标体系。其中,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4个维度,即经济发展、社区环境、社会交流、素质技能。同时这4个维度又可以分为13个具体指标,其中经济发展包括基础建设、经济收入、行业发展、居民就业;社区环境包括噪音干扰、民族文化、交通拥堵;社会交流包括知名度、社区交流;素质技能包括居民团结、生活技能、环保意识、文化保护。而且每个指标对该维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具体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除了要对假设模型的可靠性进行验证以外,还要将各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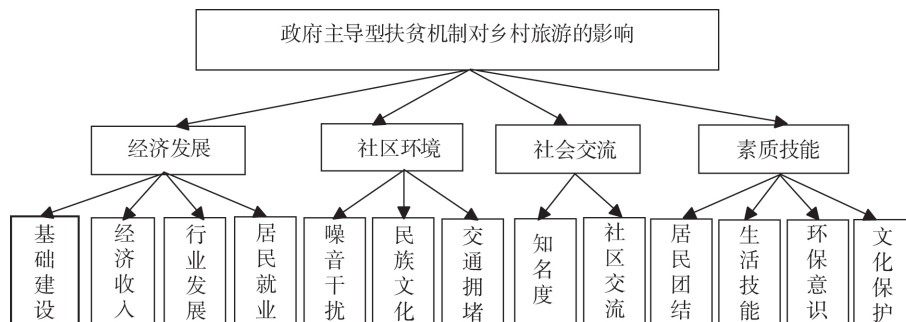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

指标对维度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从而提取出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并基于这些主要影响因子提出对策和建议。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利用 SPSS23 对数据进行因子降维分析,提取主要影响因子,再利用 AMOS 对模型进行可靠性验证,最后得出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影响程度的大小,并对验证性结果进行评价分析。

为了充分研究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了解政府在扶贫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调研组在基于可持续发展、旅游乘数效应及社区理论等旅游扶贫相关理论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并于 2018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在大理鹤庆新华村、可邑村及石林彝族第一村 3 个民族村寨进行了实地调查。调查对象为 3 个民族村寨的社区居民,问卷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基础信息,该部分设计 8 个题项;第二部分是核心问题,该部分设计 20 个题项,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本次调研共发放 587 份调查问卷,剔除 26 份无效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56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 95.6%。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情况,本文还对 3 个民族村寨的村委会、妇女协会以及当地景区村民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度访谈,访问的普通农户共有 80 余人。另外还访问了村里比较有威望的一些村民(共 28 人),并对访问内容进行了录音,有效录音有 28 份,平均录音时间是 25 分钟。调研组还从村委会处获得了 8 份当地景区的宣传资料,总共约 15 000 字。

三、实证研究

(一) 调查问卷样本人口特征状况

由表 2 可知,男女比例相差不大,男性略多于女性;调查对象中年龄在 21~35 岁的群体最多,将近占 50%;3 个村寨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都较低,48.1% 的居民都是初中及以下文凭。另外,根据访谈情况得知村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或个体经营,中老年人留在家里从事务农,而通过村里选拔出来的多才多艺的村民则主要负责村寨的景区接待工作。大理鹤庆新华村居民主要从事银饰买卖生意,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个体经营的银饰加工作坊或商铺,家里的部分成员从事景区表演和接待工作;可邑村居民白天主要下地干农活,种植玉米和烤烟等农作物,只有少数人负责景区的接待和表演工作;而石林彝族第一村 90% 以上的居民都从事石林景区的相关工作,村民主要负责讲解、接待、表演、开电瓶车及拍照等工作。

表 2 人口特征状况

人口特征属性	分类选项	频数	比例/%
性别	女	263	46.9
	男	298	53.1
年龄	20 岁及以下	71	12.6
	21~35 岁	277	49.4
	36~50 岁	128	22.8
	51 岁及以上	85	15.2
收入来源	务农	115	20.5
	个体经营	119	21.2
	从事景区相关工作	167	29.8
	其他	160	28.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70	48.1
	高中	142	25.3
	大学	134	23.9
	研究生及以上	15	2.7

(二) 探索性因子分析

1. 信度与效度

为确保指标的可靠性,在分析问卷之前首先要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只有通过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统计分析。克伦巴赫 α 是使用最广泛的信度系数,因此本文采用 Alpha 分析模型中的 Cronbach's Alpha 一致性系数来检验指标的信度,系数越大表明可信程度越高。经济学上认为当 α 系数大于 0.8 时则信度非常好,本文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为 0.852,通过了信度检验(表 3)。同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效度进行 KMO(Kaiser-Meyer-Olkin)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主要检验

变量间的偏相关性,以表明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 Bartlett 球形检验主要检验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以表明因子分析是否有效。由表 4 可知, KMO 值为 0.843(大于 0.7),可见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而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Sig.$ 值为 0.000(小于 0.01),说明因子分析有效。因此,样本数据显著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适合进行下一步的因子降维分析。

2. 因子分析结果

(1) 主成分提取。当存在多个指标时会出现指标信息重叠,因此需要提取主成分以解决自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避免回归系数的不合理现象,揭示各变量间的真实关系。主成分分析的目的是为了降维,即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关系性的指标,组合成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从中选取几个较少的综合指标但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众多指标的信息。本文通过对 13 个测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提取出 4 大主成分,这 4 大因子的解释总方差为 70.8%,即提取的 4 个主成分因子涵盖了政府扶贫影响的大部分信息,说明采用因子分析提取共同因子的结果令人满意(表 5)。

表 5 主成分提取

成分	初始特征值 / %			提取平方和载入 / %			循环平方和载入 / %		
	总计	变异	累加	总计	变异	累加	总计	变异	累加
1	5.083	39.09	39.09	5.083	39.09	39.09	2.907	22.35	22.35
2	1.998	15.37	54.47	1.998	15.37	54.47	2.546	19.58	41.94
3	1.368	10.52	64.99	1.368	10.52	64.99	2.121	16.31	58.25
4	0.755	5.809	70.80	0.755	5.809	70.80	1.631	12.54	70.80

(2) 旋转成分矩阵。为了更好地解释各项因子的意义,我们还需要进行旋转,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如表 6 所示。因子载荷系数反映的是测量指标对主成分的影响程度,经过旋转后,经济收入、居民就业、行业发展、基础建设在因子 1 上有较大载荷;居民团结、生活技能、环保意识、文化保护在因子 2 上有较大载荷;交通拥堵、民族文化、噪音干扰在因子 3 上有较大载荷;知名度、社区交流在因子 4 上有较大载荷。故因子 1 可称为经济发展因子,因子 2 可称为素质技能因子,因子 3 可称为社区环境因子,因子 4 可称为社会交流因子。从表 6 可以看出,各主成分的指标因子载荷均在 0.6 以上,说明原始指标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其中,经济收入、居民团结、交通拥堵及知名度这 4 个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在 0.8 以

表 3 信度分析

α 值	基于标准化项目 α 值	项目个数
0.850	0.852	13

表 4 效度分析

KMO 检验 抽样适度测定值	Bartlett 球形检验		
	卡方值	自由度	显著性
0.843	2 146.530	78	0.000

表 6 旋转成分矩阵

因子命名	测量指标	因子载荷			
		1	2	3	4
经济发展 1	经济收入	0.852			
	居民就业	0.831			
	行业发展	0.830			
	基础建设	0.612			
素质技能 2	居民团结		0.811		
	生活技能		0.754		
	环保意识		0.744		
	文化保护		0.608		
社区环境 3	交通拥堵			0.828	
	民族文化			0.818	
	噪音干扰			0.807	
社会交流 4	知名度				0.758
	社区交流				0.733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提取,旋转方法为具有 Kaiser 正规化的最大方差法。

上,是对主成分影响程度最大的测量指标。

(三) 验证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出因子个数,以及各个因子和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决定事前定义因子的模型拟合实际数据的能力,以试图检验观测变量的因子个数和因子载荷是否与基于预先建立的理论预期一致。根据前文因子分析的结果,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准确性,将采用 AMOS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且将在一阶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目的在于验证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与假设模型吻合。

1. 模型拟合指标

模型拟合指标是检验假设模型与实际数据是否吻合的标准依据,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假设模型和调查数据的拟合度进行验证。从表 7 可以看出,卡方自由度比值 (χ^2/DF)、RMR、RMSEA、GFI、PGFI、PCFI 等所有指标值均达到了拟合标准值的要求。其中,卡方自由度比值的拟合标准值为小于 3,若大于 3 表示拟合度不佳,若小于 1 表示过度拟合,而介于 1 和 3 之间表示拟合度良好。模型拟合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结构效度较好,即说明实际调查数据能与假设模型拟合,4 个

表 7 模型拟合指标

统计检验量	拟合的标准或临界值	检验结果	模型拟合判断
卡方自由度比值	< 3.00	1.591	是
RMR 值	< 0.05	0.039	是
RMSEA 值	< 0.08 (若 < 0.05 优良; 若 < 0.08 良好)	0.076	是
GFI 值	> 0.9	0.911	是
AGFI 值	> 0.9	0.974	是
NFI 值	> 0.9	0.971	是
RFI 值	> 0.9	0.964	是
IFI 值	> 0.9	0.930	是
TLI 值	> 0.9	0.914	是
CFI 值	> 0.9	0.929	是
PGFI 值	> 0.5	0.703	是
PNFI 值	> 0.5	0.795	是
PCFI 值	> 0.5	0.761	是

因子能解释政府扶贫影响研究的大部分信息,因子之间稳定性极好。

2. AMOS 检验模型

研究表明,政府参与旅游扶贫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社会交流、社区环境和素质技能 4 个维度上面,同时经济收入、居民团结、交通拥堵及知名度等 13 个观测变量对该 4 个维度的影响程度也不同。AMOS 分析是对假设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图 2),其中,矩形内变量表示观测变量,该变量在调查中能直接测量;椭圆内变量表示潜在变量(也叫维度),该变量不能直接测量;箭头旁边的系数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反映出观测变量对潜在变量的解释力度; e 表示残差。AMOS 检验模型进一步验证了假设模型的合理性,表明各测量指标对其维度的影响程度不一样。另外,在原有基础上加入支持发展和生活质量两个变量,表明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直接影响着当地居民对发展旅游业的态度感知以及自身的生活质量。

标准化回归系数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又称因素载荷量,根据图 2 中 AMOS 二阶因子路径图的输出结果,我们发现各维度(初阶因素)在“政府扶贫影响”高阶因素构念的因素载荷量不同,从高到低依次是经济发展(0.86)、社会交流(0.84)、素质技能(0.76)和社区环境(0.32)。从图 2 还可以看出,除了社区环境以外,其他初阶因素在高阶因素构念的载荷量以及观测变量在初阶因素构念的载荷量都比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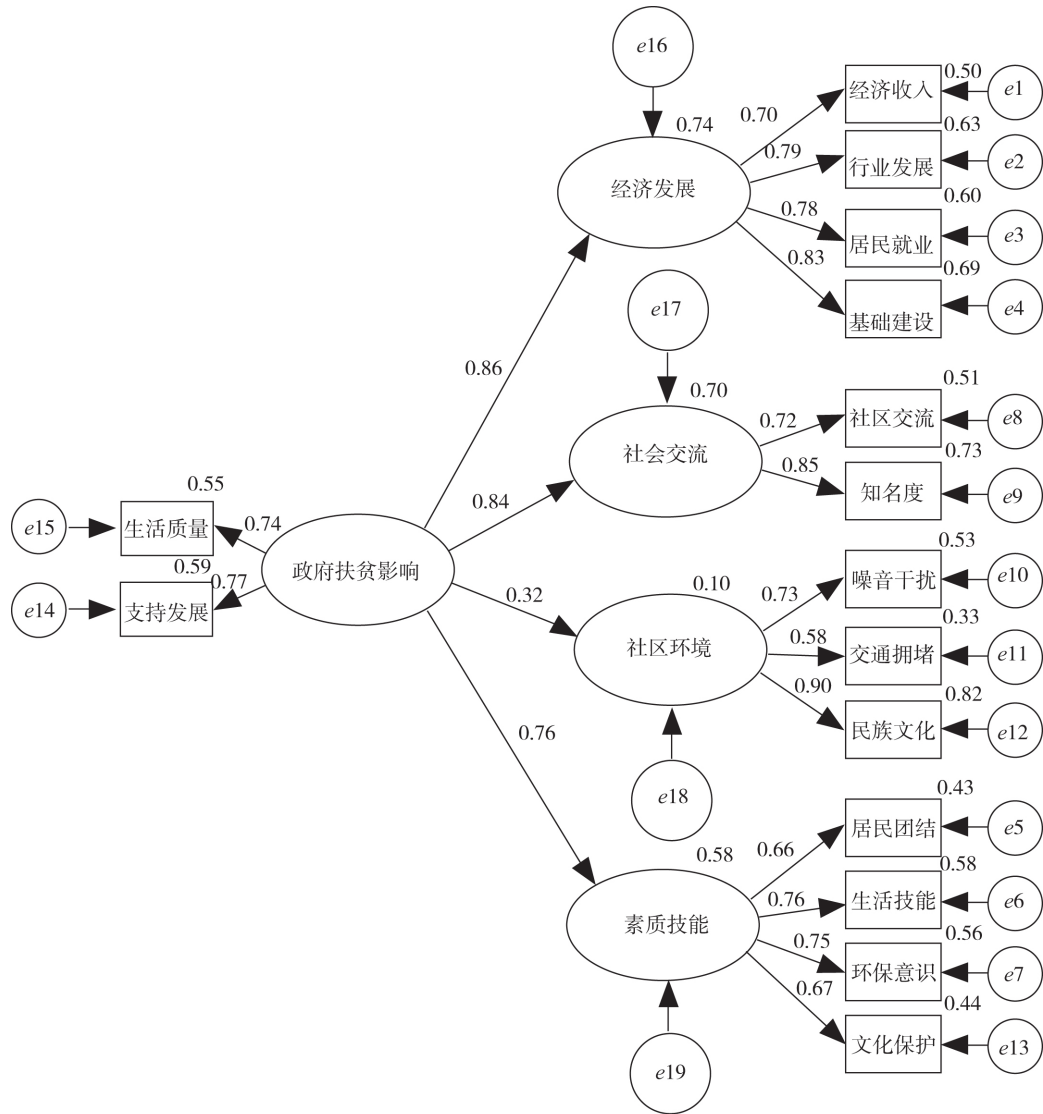


图2 AMOS 验证性分析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云南3个民族村寨为例,通过SPSS对数据进行因子降维分析,提取出4个维度因子,再通过AMOS分析对假设模型进一步验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旅游扶贫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研究表明,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能够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如带动地区和周围相关行业的发展;帮助贫困人口就业,增加其收入来源,提高妇女就业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让居民在保障基本生活水平的条件下还能享受其他更多的娱乐设施,提高生活质量。其中经济发展对基础建设的影响最为明显,影响系数为0.83。旅游扶贫具备投资少、收益高且返贫率低等特征,是非常有创新且值得推崇的一种扶贫形式。旅游扶贫带来的最基本效益便是经济效益,利用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发展旅游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帮助居民脱贫致富。

第二,旅游扶贫能够带动地区居民素质和技能全面发展。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能提升居民的素质技能,且素质技能对居民团结、生活技能、环保意识、文化保护产生的直接影响分别为0.66、0.76、0.75和0.67,都比较显著。过去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技术匮乏等经济发展非常落后的状况下,大多数居民会选择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的生活方式,收入来源单一,生活拮据。直到引入旅

游业并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合理规划建造、技术和信息的不断更新、科技人才的引进、外来人口的输入等,使得居民之间更加团结,既实现了居民素质和技能的双向提升,又提高了居民的环保意识和文化保护意识。

第三,旅游扶贫能够关注和保护生态效益。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扶贫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在开发旅游业之前首先应该考虑的因素便是社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环境对噪音干扰、交通拥堵、民族文化的直接影响分别为 0.73、0.58、0.90,其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最明显,表明社区环境每变化一个单位,民族文化将变化 0.90 个单位。旅游开发区距离居民区很近,为了能够在走访调查中测量出旅游开发是否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我们在构建模型时特意提出噪音干扰、交通拥堵和民族文化这 3 个指标。从问卷调查以及对居民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在整个旅游开发的进程中,政府起到非常好的主导作用,每天会安排人员清理景区垃圾并有专门负责人进行监管,确保景区环境优美、卫生整洁。

第四,旅游扶贫能够扩大社区与外界的交流。研究表明,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对社会交流能产生显著影响,而社会交流对知名度的直接影响为 0.85,表明社会交流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当地的知名度。贫困地区开发旅游业可以吸引大量外来游客到本地旅游,这就给了本地居民与外界人士相互交流、相互认识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吸取来自发达地区的新技术和新知识。调查中发现,居民与游客之间文化、知识和观念的交流是帮助其开阔眼界和增长见识的重要因素。旅游业所带来的贡献体现在方方面面,除了经济、生态、技能等方面,也渗透到精神和文化层面,逐渐引领贫困地区由封闭走向开放。贫困地区的村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多数是初中以下学历,生活条件比较落后,他们很少能够接触到高科技产业,也缺乏对相关市场的了解,而旅游业的开发对当地的技术传播以及居民的素质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鉴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开发优质旅游产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旅游扶贫的效果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实用性和完备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包括维持景区内正常运行的公共性和功能性设施,还应包含提供给游客们吃、住、行、游、娱等服务性的基础设施。但是由于贫困地区的旅游开发资金制约性强,缺少足够的资金投入,因此造成景区内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项目单调匮乏、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缺乏创意,加之旅游产品定位仍以观光、游览为主,从而出现游客游玩时间短、消费低等问题。因此,若想进一步提高旅游扶贫效果,在政府主导型扶贫进程中,应该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建设高水平的服务性基础设施,提高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除了完善基础设施,还应该开发优质旅游产品,使产品尽量多元化,要从产品的新颖性、独特性着手,设计出能吸引游客且有创意的旅游产品,同时注重环境保护,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从而提高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加强宣传力度,强化人文旅游资源。社会交流到知名度的路径系数高达 0.85,地区的知名度和该地游客数量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知名度的大小直接影响游客流量,同时游客流量的增加也会进一步给当地景区带来更大的知名度。加大宣传力度可以提高知名度,但单靠宣传这一种途径还是不行的,还需要开发创新旅游产品,强化人文旅游资源。云南民族贫困地区具备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旅游资源以及浓郁的民俗传统文化,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这些丰富的资源没有被重视和采用,甚至险些被人们遗忘。贫困地区若想吸引大量游客,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人文旅游资源的价值,把民族文化和旅游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彰显当地民族特色,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因此,把旅游产品定位到文化资源的价值上,不仅是为了迎合游客的消费倾向,更能传承当地的民族文化。

第三,保护核心竞争力,传承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景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研究表明社区环境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便是民族文化,系数为 0.90。景区的基础设施建造风格通常可以被模仿和复制,但景区所特有的风俗传统和民族文化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

过程中传承下来的宝藏,是智慧的沉淀。因此,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要深刻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正确引导和使用民族文化;在使用民族文化时则应尽量避免庸俗化、庸品化以及单一化,充分彰显民族文化的个性化、创新化、真实化以及多元化。本民族群众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扬具有决定权和发言权,因此在开发进程中应该考虑和尊重本民族群众的想法和意见。另外,由于民族文化是在特殊环境下长时间演变而成,在保护和发展民族村落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当地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在不破坏原来民族特色的情况下,以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向游客传播其精髓。保护民族文化人人有责,我们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逐步培养当地居民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使民族文化不断得以传承和发展。

第四,保护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提高环保意识。研究表明,生活技能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素质技能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游客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日益增强。保护环境、提高环保意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当地居民和景区工作人员应该以身作则,为游客树立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文明行为;其次在旅游配套设施上要能够激起游客的环保意识,比如在每个休息点尽可能放置垃圾箱(调查中发现,如果休息的地方没有垃圾箱,游客就会随手乱扔垃圾,环保意识较低,但是如果旁边有放置垃圾箱,游客便会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垃圾箱里,环保意识非常强);最后在旅游开发中应该加大生态技术的使用,比如林下饲养家禽、开发使用太阳能、沼气、光伏发电等,使用清洁能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旅游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张晓,李春晓,杨德进. 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多主体参与模式探析——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18(2):99-103.
- [2] 屈小静. 创新乡村旅游扶贫模式[J]. 人民论坛,2017(33):98-99.
- [3] 刘祥恒,罗明义. 乌蒙山片区旅游发展及扶贫模式研究[J]. 当代经济管理,2015(8):67-73.
- [4] 龚艳,李如友. 有限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115-121.
- [5] 李赛男,李孝坤,秦娟,等. 基于贫困度与旅游资源耦合关系的旅游扶贫模式探讨——以渝东南地区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7(4):508-512.
- [6] 徐宁,图登克珠,蒙媛.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边境旅游扶贫开发思路及模式研究[J]. 中国藏学,2017(4):134-138.
- [7] 银马华,王群,杨兴柱.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J]. 经济地理,2018(4):215-224.
- [8] 饶勇,徐圆,骆泽铭. 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关系性嵌入与知识转移关系[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28-133.
- [9] 桂拉旦,唐唯.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J]. 西北人口,2016(2):64-68.
- [10] 杨德进,白长虹,牛会聪. 民族地区负责任旅游扶贫开发模式与实现路径[J]. 人文地理,2016(4):119-126.
- [11] 葛绪锋. 刍议文化旅游中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J]. 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2):61-64.
- [12] 陈友华. 我国旅游扶贫模式转型升级新思路[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6):717-721.
- [13] 邱硕立.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可能性、重要性及模式选择[J]. 贵州民族研究,2013(5):148-150.
- [14] RENARD Y.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pro-poor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the St. Lucia heritage tourism programme[J]. Tourism research,2001:32-37.
- [15] FLEISCHER A, FELSENSTEIN D. Support for rural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0(4):1007-1024.
- [16] NILSSON P Å. Staying on farms: an ideological background[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2, 29(1):7-24.
- [17] 何景明,李立华. 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125-128.
- [18] 黄国庆.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J]. 求索,2013(5):253-255.
- [19] SCHILCHER D. Growth versus equity: the continuum of pro-poor tourism and neoliberal governance[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07, 10(2): 166-193.

- [20] WILKINSON P, PRATIWI F. Gender and tourism in an Indonesian villag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5, 22(2): 283-299.
- [21] 杨国靖, 肖星, 肖笃宁. 陇南山区生态旅游资源评价及开发策略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3(4): 53-59.
- [22] 银马华, 王群, 杨兴柱, 等.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 36 个县(市)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8(4): 215-224.

(责任编辑: 康兰媛; 英文校对: 葛秋颖)

Impact of Government-l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of Three Ethnic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ZHOU Changchun, HE Yueyue, CAO T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ree ethnic villages in Yunnan as examp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l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ourism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 factor dimension reduction analysis of data is carried out by SPSS, four dimension factors are extracted, and the hypothesis model is further validated by AMOS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ourism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exchange, community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skills. At the same time, these four dimensions correspondingly affect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income, industry development, employment of residents, noise interference, ethnic culture, traffic congestion, visibility, community exchanges, unity of residents, life skill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protection. Combining with research results, four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search of scholars in the same industry: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tourism infrastructure and develop high-quality tourism products, to strengthen propaganda and strengthen humanistic tourism resources, to protect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inherit national culture, and to prot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resources and raise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Key words: countryside tourism; tourism-based poverty alleviation; government-orient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factor analysis